

劉明輝
孫戈 整理

世界報業考察記

戈公振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世界報業考察記

劉明輝
整理
孫戈

戈公振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世界報業考察記 / 戈公振著; 劉明輝, 孫戈整理.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7
ISBN 978-7-100-14370-7

I. ①世… II. ①戈… ②劉… ③孫… III. ①報紙—
新聞事業史—研究—世界 IV. ① G219.1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7) 第 173111 號

權利保留, 侵權必究。

ISBN 978-7-100-14370-7



世界報業考察記

戈公振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山東鴻君傑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4370-7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開本 889×1194 1/16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張 13.75

定價: 168.00 元



戈公振（一八九〇—一九三五），原名紹發，字春霆，號公振，

江蘇東臺人。中國現代著名新聞學家、愛國新聞記者、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開創者。在《時報》和《申報》先後工作近二十年。

一九二〇年創《圖畫時報》，一九二一年任新成立的「上海新聞記者聯歡會」會長。曾以記者身份赴法國、瑞士、德國、意大利、英國、美國、日本等國考察新聞業。一九二七年受國聯邀請出席在日內瓦舉行的國際新聞專家會議。「九一八」事變後，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並以記者身份隨國聯調查團赴東北調查日軍侵華真相。著有《中國報學史》《世界報業考察記》《東北到底聯》《新聞學》等，並編譯《新聞學撮要》等。

序

秦紹德

聽到戈公振先生八十六年前寫的《世界報業考察記》失而復得的消息，沒有比這更令人興奮了！八十五年前，即一九三二年一月，在日本發動的淞滬戰爭中，商務印書館大樓被炸毀，許多書稿資料付之一炬。據說，戈公振先生交付商務的書稿《世界報業考察記》還沒來得及出版也在其中。聞者無不惋惜。聽聞上海圖書館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和戈氏後人決定將遺物中保存完好的遺稿重新出版，不禁喜出望外。今年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建館一百二十周年大慶。他們決定出版這一遺著以作紀念，無疑也應該載入史冊。這不僅還了歷史宿願，可以告慰戈公振先生在天之靈，而且又繼承了商務的優良傳統，以出版和保藏文化精粹為己任。有什麼可以比這更好地慶祝自己的生日呢！

作為大眾傳播媒介，中國近代報刊不是從中國古代報紙發育而成，而是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移植過來的。無論從舉辦宗旨，還是從傳播內容、形式來說，古代報紙和以傳播新聞為職責、以大眾為發行對象的近代報紙，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前後，西方傳教士和商人通過不同途徑來

到中國。他們帶來的，不僅是宗教和貿易，還有傳教和通商所需要的公共傳播媒介。而這種媒介是他們根據母國的樣本到中國來複製的（自然要適應中國的情況稍加改造）。所以，中國近代報刊的誕生期，外國人所辦的外文報刊占據絕對壟斷地位（也就是戈公振所說「外報創始時期」）。這使中國人打開眼界，原來世間還有如此飛快傳遞消息的東西。林則徐是「睜開眼睛看世界」較早之人，他很快注意到外國人所辦之報刊，為禁煙計，他組織人翻譯外文報刊，在官場內部流傳。還有一批中國人則產生了自己辦報刊的潛在想法。

這樣的大背景就決定了，中國近代報刊從誕生起一直以西方報刊為模板而加以學習的。最早「學生意」的是一批舊式文人，有在宗教印刷所供職的王韜等人，在商業報刊中謀職的錢昕伯、陳靄齡、蔡爾康等人。他們接觸、瞭解了外報，同時也把中國傳統文化帶給了供職的報刊。中國近代報刊的發展真正打開局面，還是和政治鬥爭聯繫在一起。無論是企圖使朝廷革故鼎新的戊戌變法，還是以推翻清廷為目標的辛亥革命，都使得中國人自己辦的報刊得到空前的發展。近代報刊作為大眾傳播媒介，被中國社會接受了。以至於晚清朝廷和各地也隨潮流辦起了官報。但這時的中國報刊，從形態到生產流程都是很落後的。學生向先生學習，學得很艱苦，還沒有學像。畢竟，起步相距一二百年。

辛亥革命以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有了長足的發展。中國人逐步獲得外國人所

辦報紙的股權，中國報刊逐漸向現代化大路上迅跑。這個階段一直延續到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國之前。上海的大報《申報》由史量才等人接辦，並開始企業化經營，就是一個典型事例。上海的報館街——望平街達到繁榮也在這時。中國報刊進步的特徵是，新聞的採集更加迅捷，電報、電話已廣泛採用；報刊的印刷普遍採用高速輪轉機；發行也有了便捷的交通工具：汽車和火車；報館的經營更加商業化，廣告已成為報社支柱；報業資本積累起來，規模迅速擴大，不少報館建起了標志性大樓。戈公振從一九一四年進入《時報》當校對，到後來擔任總編輯，所經歷的正是中國近代報業的發展過程。對於發展中的艱難，以及存在的弊端，必有切身的體會。他屬於區別于王韜等人，又區別于梁啟超、汪康年、于右任等人的第三代報人。受過傳統中式啟蒙教育，又受過一點西式教育。

戈公振是一個職業新聞工作者，但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從業者。他熱愛自己的職業，兢兢業業做好每一份工作，但又不滿足於每天僅把本份工作做好，而是一邊幹，一邊研究琢磨問題。套用一句現代語言，他是一位研究型的新聞工作者。他在《時報》任要職的同時，竟耗費幾年業餘時間，蒐集資料，寫就《中國報學史》這一開創性新聞史學著作。正是在寫作過程中，使戈公振萌生了去國外考察的念頭。他與當時許多人一樣，心目中是以西方現代報業，特別是諸如倫敦泰晤士報、紐約時報等世界著名大報為榜樣學習的。辦成那樣的大報是職業的理想。但畢竟沒有親臨其境考察過。一個偶然的機緣促成了他的考察之行。

一九二七年八月，他應國聯邀請，出席在日內瓦舉行的國際新聞專家會議。在會上，他結識了泰晤士報的上層朋友。經他們介紹，遂成考察之行。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往往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結合，必然性存在於偶然性之中。中國人去歐美大報考察學習是必然的、遲早要發生的。但歷史地落到戈公振頭上，這又具有偶然性。戈公振從事報業十五年，又有開創性研究成果，沒有誰比他更合適去考察世界報業了。

現在可以說，他是第一個近距離觀察世界現代巨型日報的中國人。《考察記》寫得極具現場感。從新聞採編寫到廣告安排，從文字生產寫到印刷發行，甚至從生產環節寫到職工福利。既有現場描摹，又配以數據統計。如果仔細地讀一遍《考察記》，等於到了現場。作為一個曾經的報人，我讀後感到特別親切。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如果沒有多年報館工作的親身實踐，《考察記》不可能寫得那麼貼切、內行。一般人初進現代報館，看到採編部門挑燈夜戰，印刷車間震耳欲聾，早就暈了，更不用說看出什麼名堂。《考察記》呈現的却是有條不紊的新聞生產過程。《考察記》還具有歷史感。除了現場記錄之外，戈公振還寫了倫敦泰晤士報的報址變遷、印刷史和主持人更替史，附錄北岩爵士小傳。對紐約泰晤士報，戈公振則翻譯了喬瑟夫所寫的「紐約泰晤士之精神與發育」一文作為附錄。初讀者以為附錄的歷史與考察無關，有累贅之感。其實，這正是戈氏高明之處。知史方能鑒今。站在歷史的高度來看英美這些大報，方知報紙孕育不易，成長更難，其中堅持一以貫之的崇高宗旨與精神尤為重要。這是中國報紙要學習的另一方面。

有縱深感，《考察記》就顯得厚實。如果不是像戈公振這樣具有報學史的學養，也寫不出這一部分來。

考察是爲了學習，學習是准備實踐的。這就是實踐家和學者的區別。一九二八年年底，考察結束回國，戈公振是有其打算的。由於人事的原因，他沒有回到熟悉的《時報》，却被上海另一家大報《申報》聘爲總管理處設計部副主任。這是一個什麼職務？其時，《申報》老闆史量才正准備對已發行了兩萬號的老《申報》進行改造。新成立的總管理處是一個設計、推行革新措施的機構和平臺。參加總管理處的還有黃炎培、陶行知等人。在國外考察時，戈公振已接受了史量才的聘用。回國正好施展宏圖。從戈公振進入《申報》最初做的幾件事，就可知他的考察成果正在逐步付諸實現。一九二九年，戈公振創辦申報資料室，親自帶人剪報，收集資料，分類成列。一九三〇年，戈公振創辦《申報圖畫週刊》。「九一八」事變後，國內形勢大變。戈公振親赴東北採訪，此後又投入上海淞滬抗戰後的救亡運動，離開《申報》漸遠。但我們從《申報》三十年代初所創設的各項文化、社會事業中，仿佛可以看到戈公振考察成果帶來的影響。一九三一年十月起，《申報》先後創辦了《申報月刊》《申報年鑑》，出版了《申報叢書》，創辦了「申報流通圖書館」，改進了讀者服務工作。《申報》如同泰晤士報那樣，發展成爲社會影響越來越大的報業出版集團和社會公共團體。戈公振的部分理想得到實現。

作爲第一手歷史資料，《考察記》忠實記錄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們新聞界的前輩如何懷着理

想，如饑似渴地向英美先進的報業學習，記錄了他們當時觀察世界的視野和內心的活動。這無疑為中國新聞史增添了珍貴的一頁。而《考察記》中體現的他們對於新聞事業崇高社會責任的追求和堅持，是值得今天的媒體人深思和永遠銘記的，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這就是戈公振先生在前言中所說：「深信一事之成功必在長期奮鬥以後，且非純粹營利性質，而為對於公眾之一種貢獻。」

懷著對新聞前輩的崇敬忝為序

二〇一七年酷暑中

迎合世界之新潮，發皇吾儕之美質（代序）

黃旦

一九三二年一月底的一個夜晚，日軍轟炸上海，在商務印書館靜候出版的戈公振先生之《世界報業考察記》，恰遭此飛天橫禍，頃刻化為灰燼，讓人惋惜不已。本以為自此已無再見之可能，詎不料今天重現於天日，且仍由商務印書館執其事畢其功。驚喜之餘，不禁為造化弄人，緣分有定而感嘆。

戈公振的這次出訪，起程於一九二七年初，回國則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書稿所記正是他途中走訪英國《泰晤士報》和美國《紐約時報》之所見所得。書稿自序中云，「居國外二載，就見聞所及，蒐材綦富」，「今將途中已編成之世界報業考察記一部分，先付手民」，交代的正是這一背景。不過據其侄戈寶權，該考察記實成於其回國之後，他還曾親自參與其事，抄寫和校閱過這部分稿子。〔一〕以此推測，所謂「途中已編成」的可能是一個初稿，付梓出版前又做過一番整理。

時年三十七歲的戈公振，是首次走出國門，儘管早就存「壯遊世界」〔二〕之心。臨行前他專門在自

〔一〕 見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前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五五年，四頁。

〔二〕 洪惟傑編著：《戈公振年譜》，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二十四頁。

已任職多年的《時報》上刊出啓事，向社會廣而告之，可見是有幾分激動的。不清楚在其原來安排的行程中，是否有走訪該兩家報社之籌劃，就其考察記中言及的兩位聯繫人，都是在日內瓦參加國際報界專家大會所結識，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戈公振以及當時的中國報界，對於國外這兩家大名赫赫的報紙，不僅不陌生而且是多有嚮往。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北岩自天津轉而南下上海時，《申報》專派汪英賓到南京迎接，並在報上登了他的照片，贊頌其「文章言論有左右英國政治之力」。滬上其他報館也不甘落後，推舉一代表赴甯接候〔一〕，甚是隆重。仔細體察一下可發現，在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中，就不時閃現它們的影子，並作為新聞專業主義實踐的典範，成為比照分析中國報紙狀況的標尺。

戈公振不是一個容易歸類的人物，按目今的時髦說法，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跨界者，在「報」和「學」中均享有不小的成績。以「報」而論，在出國時他就具十五年報紙工作之經歷，由校對、助理編輯、編輯直至總編輯，還擔任過「上海新聞記者聯歡會」第一任會長，在新聞圈頗有影響。〔二〕在該次訪察結束回來時，《申報》專門為之發了報導，稱「名記者戈公振氏」在首途赴歐美日各國遊覽並考察

〔一〕《北岩爵士今晚抵滬》，《申報》，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二〕參前揭《戈公振年譜》。

新聞事業之後，業於昨日下午二時回抵上海，共計有潘公展等二十餘人到碼頭相迎，還配發了一千人在碼頭合影的照片，可見算是上海灘上一件不小的事。「二」於「學」而言，且不說他在各種刊物上針對中國報業狀況所發表的諸種文字，也不提早年編譯的《新聞學撮要》，後來寫就的《新聞學》，單就一本一九二七年問世的《中國報學史》，就足以奠定其地位，至今仍是治報刊史者所不可缺的案頭書。此種「學」與「術」的渾然交融，既體現了戈氏四十五年人生的獨特性，同時也奠定了其考察報業的基本眼光和思路。

出於報紙一綫摸爬滾打多年的經歷和偏好，戈公振的現場觀察，重點是在這兩家世界著名報紙的部門構成、結構格局及其生產運轉和日常管理。採編自然是必經之地，此外還「遍歷排字鑄字饒版印刷諸室」，甚至包括人員福利、廣告營銷、經費開支，乃至食堂餐廳淋浴室換衣櫃等等，都在他的視線之內。看得多，記得也細，戈公振頗像一個細心導遊，將兩個報社的基本狀況，從頭到尾一一指點，連機器發出的噪音都不放過，很有現場感。然而，他所具有的「學」的興趣和素養，又不滿足於停留在現象的介紹，不僅內含自己的思考，更意在借此激發人們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故特地「再從歷史上加以介紹，俾世之治報學者，知所考鏡焉」。現場紀錄和報紙歷史的疊加，即前面部分是親身所見所聽，後

「一」《戈公振昨日回國》，《申報》，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面部分是歷史追述，構成該考察記的基本格式。

看上去，這很符合戈氏的兩栖身份，但却是一個很奇怪的組合。按理，現場考察與歷史，完全處於兩個不同的時段，在敘事方式上也有根本差異。最簡單地說，考察是考察者在場，是第一人稱；歷史，是對以往事迹的整理和書寫，總是以第三人稱出現。現在戈公振却是以「參觀記」為名，將二者統編一起。當然，在新聞報導中也常常根據需要，添加一些有關被報導對象的背景材料，比如其來龍去脈，以便讀者瞭解。但在戈公振的這兩個參觀記中，歷史部分顯然不是作為一種輔助性背景來處理的，當他特意注明北岩爵士小傳屬於附錄時，顯見表明其他的歷史部分不是附屬，而是與實地參觀記錄並存的主體內容，具有同等重要性，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敘述的重組不能被認為是一種「風格技巧」，也不是遣詞造句意義上的修辭，而是涉及整套書寫的程式和規則，屬於「知識詩學」的研究範疇。〔一〕朗西埃的這個說法為我們理解戈公振提供了思路。

《泰晤士報》戈公振去了兩次，第一次看上去主要是聽介紹，重點是其採編狀況。可能是受到干擾，接待者韋廉博士「頻有人訪」，故而時間不夠，所以又去了第二次。這一次則是由報社人員帶領，直接走訪廣告、印刷、出版等部門。從這一部分的篇幅看，參觀部分比較簡略，相反，歷史的部分占了其三

〔一〕雅克·朗西埃：《歷史之名——論知識的詩學》，魏德驥、楊淳嫻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三十一、十六頁。

分之二，在嚴格意義上，甚至與參觀記名實不副。為何在處理上薄此厚彼，原因不詳，但關於歷史部分的必要性，戈公振作了這樣的說明：該報「在國內及國際間，不失其領袖報紙之地位」，除了「英國國運昌隆，有一言而左右世界政局之觀」之外，那就是報紙「自創始以迄今茲繼續不斷之努力」，於此，「爰不憚觀縷，再從歷史上加以介紹」。按此說法，我們可以感覺到，在戈公振眼裏，《泰晤士報》之所以「有一言而左右世界」，有其自身理由，那就是「繼續不斷之努力」，這一過程迄今仍在繼續。現場考察中所聽到看到的一切，不僅是此種努力所致，而且就是其外化。在這個意義上說，《泰晤士報》的歷史與現狀實為一體，不能分割，並必然是在「繼續不斷之努力」中互為照應。

《紐約時報》參觀記則相反，現狀占了大頭，「記之特詳」，尤其是關於「物質上之設備」。因為這「較歐洲報館為完美」，「足供我國報館之參考也」。同樣與在倫敦參觀不同的是，戈公振在《紐約時報》是直接進入現場。在《紐約時報》陪同人員引領下，乘電梯先是「直達頂端，然後逐層而下」，「直至地層而後止」。頗值注意的是，他的參觀記的順序却不是按此「逐層而下」，而是開始於三樓的新聞部，然後跳到八樓的週刊部，再是十樓編輯部，完了忽又下至四樓的排字房、地下室的印刷車間，重再上行到五樓推銷部，而後下降至二樓的發行和廣告，最終止於十四樓的發行人辦公室，也就是整個報館的中樞區域。

這種上上下下的記錄綫路，應該是經過精心考慮的。前面已經說過，戈公振算是資深記者，從新聞部開始到編輯部再到印刷、廣告和發行，充分反映了他作爲一個報人的興趣點，亦即一個報社的新聞生產及運作的基本流程和主要環節。毫無疑問，這也可以滿足他理解的一般讀者對於報館的好奇心，「使未身歷其境之讀者」，則對此每日價格「僅二分之印刷物，初無奇于晨間之一杯香茗與麵包，而不知製造此日與我啓牖之一束報紙，其原料及工作，乃至廣泛而複雜」。最值得留意的是其最終停留處，即報社的「執行人辦公處」，也就是發行人之所在。發行人辦公室「監督各部複雜之工作。發行人于各項事務及執事者均充分熟悉，不愧其爲此集團中之主體」，寥寥幾句，就突顯其功能和地位之重要。與此相映襯，戈公振不厭其煩地爲讀者描畫了辦公室的面貌：自其窗中外眺，「可瞭望市中心及東南北三極端」，可見視線極好，有登高望遠之感；內裏「壁間張世界名人之署名像片——同業之發行人及主筆，各外國政府今昔之外交官吏，美國之新舊總統，大學校及神學院長，以及國內外各辦公署領袖」，還有報館「附近之風景畫」；室中有「圖書架，度置該報各種出版物。桌椅均胡桃木製，案頭常供養悅目之鮮花」，處處呈現出「陳設修潔而莊嚴」。這，又恰好與居高環望耳聽八方的窗外透視相得益彰。內外交融，着力的是發行人辦公處所，烘托出的是發行人統攝整個報社的崇高之地位：《紐約時報》「內部工作之複雜與宏大」，「全館組織，無殊一家族」，均與發行人密不可分。「爲今之發行人，

自一八九六年經理此報，得有破產之境而躋于精力彌滿聲威鼎盛之地位」，「許由其天賦之特性及家庭之教育」。報紙的偉大之成功，「美邦之際會風雲，亦莫非由於其國民之富于此種特徵」。走筆到此，戈公振結束了參觀考察之記敘，話頭一轉，立即續接上《紐約時報》歷史，「美人喬瑟夫氏所著紐約泰晤士之精神與發育一文，筆墨簡潔，足供其歷史上之研求」。就像英國《泰晤士報》的「繼續不斷之努力」，戈公振則是抽出《紐約時報》的「精神與發育」，實現歷史研求和現實考察的對接，以明瞭報紙「聲威鼎盛」的過程。

於此可見，在戈公振的筆下，現狀和歷史既不是兩個處於不同時間端點的部分，也不是從歷史到現狀的時間流程——就像其《中國報學史》中所顯示的那樣，而是互為印證的循環體：現狀激引起歷史的回望，歷史則為現狀做證明。戈公振用一種抽象的「努力」和「精神」，消弭了二者的時間差，將不同空間架接整合，使本不相干的部分形成首尾呼應，構成動態的渾然體，好似一條雙頭蛇互相咬住對方。就其功能而言，這可以將自己所見所不便表達的部分，借用他人——歷史來道出。若以朗西埃從言說存在角度對「敘述」和「論述」之所分，戈公振的參觀記錄可以被認定為一種敘述，歷史的部分相當於「論述」。《世界報業考察記》是一種以「注釋兼解釋的論述為架構之敘事」，是在「論述的系統